

人民日报

RENMIN RIBAO

1979年5月14日 星期一
农历己未年四月十九 第11266号

检阅全军体育工作成就的一次盛会

解放军第四届体育运动大会在京开幕

三千多名运动员决心创造优异成绩，推动部队体育运动蓬勃开展，促进部队革命化现代化建设

华国锋邓小平等同志出席开幕式 徐向前同志讲话

新华社北京五月十三日电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届体育运动大会，今天在北京隆重开幕。

华国锋主席，邓小平副主席，出席了开幕式。

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国务院其他领导人徐向前、陈锡联、韦国清、张廷发也出席了开幕式。

人民解放军驻京部队指战员和首都工人、社员、学生、机关干部三万五千多人参加了开幕式。

这届运动会是检阅全军体育工作成就的一次盛会。来自北京、沈阳、济南、南京、福州、广州、武汉、成都、昆明、兰州、乌鲁木齐各部队和海军、空军、第二炮兵、工程兵、铁道兵、基建工程兵以及军委直属队的三千多名运动员，精神抖擞，意气风发，决心在比赛中创造优异成绩，推动部队体育运动的蓬勃开展，促进部队的革命化、现代化建设。开幕式在北京南口装甲兵靶场举行。场上彩旗飘扬，“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的巨幅标语竖立场上，整个场地的气氛庄严而热烈。上午九时半，在《运动员进行曲》的乐曲声中，裁判员、运动员的队伍，跟随举着“八一”军旗的前导队，步伐整齐地进入会场。这时，全场观众热烈鼓掌，预祝体育大军在比赛中取得好成绩。

全军第四届体育运动大会主席团主任杨勇致开幕词。他说，这届运动会在国内外一派大好形势下举行的，一定要开得好，开得精彩，推动我军教育训练和体育运动的蓬勃开展，增强官兵体质，锻炼身体，磨炼勇敢坚韧精神，提高部队战斗力，为建设现代化革命军队作出贡献。

中央军委副主席徐向前同志在热烈的掌声中讲话。他说，粉碎“四人帮”反党集团以来，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取得了显著的成绩。我军的建设也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在新的历史时期，我们要遵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解放思想，开动机器，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要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要全面贯彻落实中央军委关于加强我军建设的方针和任务，认真总结和学习自卫还击作战的宝贵经验。坚持以革命化统帅现代化，加强政治思想工作，努力搞好教育训练，提高部队军政素质，保证现代化建设的顺利进行。要提高警惕，加强战备，随时粉碎来自任何方面的侵略，使我们的国家有个和平安宁的环境，为保卫“四化”作出贡献。



◇◇◇ * ◇◇◇

华主席、邓小平副主席和中央军委副主席徐向前等，于五月十三日出席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届体育运动大会的开幕式，并观看了军事项目表演。新华社记者 官天一摄

社会科学院纪念五四运动六十周年学术讨论会闭幕

把思想解放运动继续推向前进

会议围绕解放思想、民主和科学等问题进行了讨论。当前，解放思想，就是要坚持三中全会精神，理论和实践紧密结合，走出一条中国式现代化道路

本报讯 中国社会科学院纪念五四运动六十周年学术讨论会，五月二日开幕，进行了热烈的讨论，已于五月九日胜利闭幕。

参加这次学术讨论会的，有来自中央和全国各省、市、自治区社会科学研究机关、部分高等院校及有关有关部门的代表二百六十四人。这次讨论会共收到论文一百五十六篇。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周扬同志在开幕式上作了《三次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的报告。

黎澍、王若水、侯外庐、胡绳、周培源、杨超、齐振海、吴家麟、李秀林、温济泽、彭明、张岱年、楼宇烈、蔡尚思、李锐、胡华、张静如、步平、陈善善、阮铭、丁守和、胡曲园、孙昌熙、王瑶、陈涌、钟敬文、叶水夫、夏鼐、赵复、钟沛璋、罗璋、陈碧笙、廖盖隆、马沛文等同志向大会交了论文，或者在会上介绍了自己的论文，或者在会上发了言。此外，“艾思奇同志文稿整理小组”还送来了艾思奇同志没有发表过的遗稿《五四运动前后两种世界观的斗争》，这篇论文也引起了到会代表的重视。

周扬同志所作《三次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的报告，是讨论会上第一篇最高的学术报告。到会同志对这个报告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一致认为周扬同志对五四运动以来的三次思想解放运动所作的理论概括，符合历史实际，有很大的现实意义。目前我国正在进行的思想解放运动，是五四运动和延安整风运动的合乎规律的继承和发展，它对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将产生巨大的推动作用。我们一定要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导下，把这个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继续推向前进。思想解放的方针，也就是“放”的方针，这是长期性的方针，而不是临时性的方针。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是人类最解放的思想，它反对一切教条、一切僵死，一切想要建立最终思想体系的企图。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就要坚持它的根本——理论和实践的统一。理论要通过实践的检验而不断地改正、补充、丰富和发展。在当前来说，解放思想，就是要坚持三中全会精神，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普遍真理，同在中国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这个新的革命实践，紧密结合起来，走出一条中国式的实现四个现代化的道路。

到会同志认真分析了当前社会上存在的两种思潮，认为对于那股怀疑和否定四项基本原则的错误思潮，我们应该足够重视，作坚决的斗争。同时要清醒地看到，那种由于林彪、“四人帮”的流毒尚未肃清，思想仍处于僵化和半僵化状态而产生的怀疑和否定三中全会精神的错误思潮，更带欺骗性。为了排除这两种错误思潮干扰，我们要继续肃清林彪、“四人帮”流毒和影响，充分肯定三中全会以来各条战线取得的伟大成果，防止把思想解放和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对立起来。

到会同志充分讨论了五四时期提出的民主和科学的口号，认为这是当时推动思想解放的锐利武器，在历史上起过巨大的革命作用。五四运动后，民主和科学的口号为我们党所继承和发展，并形成了优良传统。但是在林彪、“四人帮”横行时期，这个传统受到很大破坏。我们要用很大的努力把它迅速恢复和发扬起来。发扬民主是促进科学不断繁荣发展的前提条件。没有民主，就没有科学。在社会科学研究中，民主精神首先表现为以平等的态度进行自由讨论，不能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只能一切服从真理。同时，民主精神也表现为对科学研究的态度上受到任何限制，“科学无禁区”。做不到这些，也就没有真正的科学研究。到会同志还对民主和专政、民主和法制、政治民主和学术民主等问题，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有的组对五四时期历史人物的评价问题，着重进行了讨论。大家认为，按照历史唯物论主义，历史地、实事求是地评价历史人物是思想解放的一个内容，也是学术研究中坚持科学态度的一个表现。五四时期曾存在着好就好一切、坏就坏一切都坏的形式主义偏向，六十年来说这种偏向并未彻底克服，它对实事求是地评价历史人物造成很大困难。在小组会上，同志们对李大钊、陈独秀、胡适、吴虞等历史人物的评价问题，展开了热烈讨论。有的组着重讨论了“五四”时期新文化运动的主将鲁迅先生，认为多年来林彪、“四人帮”神化鲁迅、歪曲鲁迅、利用鲁迅搞阴谋，这些流毒尚未肃清，对研究鲁迅是不利的。我们必须尊重历史，尊重事实，坚持无产阶级党性原则和科学性一致的原则，这样才可能对历史人物作出客观的、实事求是的评价。有些组还对五四运动历史问题、文学问题等进行了热烈的讨论。

九日午的最后一次全体会议，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邓力群同志主持。副院长于光远同志在会上讲了话。会上还一致通过了关于征集五四运动历史文献的倡议和重修李大钊烈士墓的倡议。

这次学术讨论会，自始至终，贯彻了三中全会发扬民主的精神，充满了学术自由的空气。发言的同志，都能做到畅所欲言，各抒己见，互相尊重，以同志式的革命态度进行讨论。大家谈到我国建国三十年来在文化、学术上还处在落后状态，感触很深。一致表示今后要急起直追，刻苦努力，有所建树，有所创新，有所前进。

把理论研究的空气进一步活跃起来

本报评论员

远的历史意义。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

科学无禁区。在理论问题上，大家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敢于提出新问题，敢于发表新意见，这是思想活跃的表现。有不同看法，可以继续讨论。真理是愈辩愈明的。有些问题一时难于判断，也可以留待实践去检验。我们一定要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坚持三不主义。只有这样，真理才能得到发展。

三中全会指出，实现四个现代化，也就必然要求改变一切同生产力发展不适应的活动方式和思想方式。现在还有不少同志头脑僵化，思想落后于实际。他们的实践已经进入一个新时期了，他们的认识却还停留在旧阶段。新时期向我们提出了许多新问题，其中有的是在书本里找不到现成答案的。这就需要我们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普遍原理同四个现代化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得出新的结论。这才是真正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但某些同志却认为，“坚持”就是原封不动，“句照搬”。林彪、“四人帮”的“句句照搬”，“按既定方针办”的流毒，还在他们头脑里作祟。我们还需要继续宣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个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

至今还有一些地方对这个问题没有认真组织学习讨论。我们希望这些地方能补上这一课。

理论是行动的指南。重视理论学习，加强理论研究，开展理论讨论，已经成为一项刻不容缓的重大任务。希望各地和各部门的党委把这个工作抓起来，使理论研究的空气进一步活跃起来。

却非常薄弱，搞生产还要向国家贷款，不少社员家庭是超支欠账户。李学智同志运用这种对比方法教育古城大队的干部，要他们在抓好粮食生产的同时，一定要重视开展多种经营，走农工副全面发展的道路。现在，古城大队剩余劳动力已经得到了合理安排，多种经营和副业生产一天比一天活跃。

宁夏区党委负责同志每到一地，很注意了解不利于安定团结的因素。区党委常委陈冰同志在贺兰、永宁、平罗等县和石嘴山市郊区一些社队调查研究中，看到一些地方出现了不利于安定团结和生产建设中一些带倾向性的苗头，他一面帮助基层解决这些问题，一面把了解到的情况汇报给区党委。区党委和区革命委员会认为他汇报的情况有普遍意义，及时向全区各地发出《关于当前农村工作几个问题的通知》。《通知》中重申了稳定三级所有制、尊重生产队自主权同接受国家计划的辩证统一关系、加强对农业的领导、加强思想政治工作等问题。

宁夏区党委负责同志到农牧业生产第一线

研究解决新问题继续贯彻三中全会精神

据新华社银川五月十三日电 新华社记者谷忠诚报道：宁夏回族自治区党委负责同志到农牧业生产第一线，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同基层干部一起认真贯彻落实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发展了农村牧区的大好形势。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宁夏农村牧区形势发展很快。其突出表现是，党的政策深入人心，民主办社空气比较浓厚，干部、社员心情舒畅，工作和劳动热情高涨。社员出工人数和劳动工效普遍高于去年，各项增产措施正在落实。全区四百多万亩夏粮作物苗全苗壮；引黄灌区造林面积比去年同期增长百分之十二，山区和草原牧区植树造林和四旁植树进度快、质量好；畜牧业生产也有新发展。

为了贯彻落实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各项方针

政策，扎扎实实地实现工作着重点的转移，区党委多数常委分赴六盘山区、引黄灌区、草原牧区的一些县、社、队、自治区直属机关也有三百多名干部深入到农牧业生产第一线。

固原地区是农业生产比较后进的山区，以前有不少社员靠国家贷款搞生产，靠国家返销粮过日子。近两年来，特别是三中全会以后，这个地区的形势有了一定好转。但是，由于林彪、“四人帮”极左路线流毒深广，一些干部生怕批极左和落实政策“过了头”，犯“方向路线错误”。区党委副书记薛宏福在调查中了解到这一情况后，就有针对性地进行了思想教育。他走村串寨，召集座谈会，同干部、群众进行了座谈，和他们一起学习三中全会精神和党的有关政策，共同总结本地区农业生产出现

“三起两落”的经验教训，使大家认识到，必须肃清林彪、“四人帮”极左路线的流毒，坚持落实政策，才能够充分调动群众的积极性，加快农业发展步伐。入春以来，这个地区对基层干部和社员中的冤假错案平反工作抓得很紧，各社队普遍加强了经营管理，逐步建立健全各项责任制，并因地制宜地制定了发展农林牧业的具体措施，在政策允许范围内，给社员划了一定数量的荒山荒地种草、植树，扶持社员发展养羊、开展副业生产。

随着党的各项政策的进一步落实，宁夏农村不少小队出现了人多活少的现象。特别是那些生产水平高、收入多的小队，这个问题表现得更为突出。在这种情况下，一些小队不是千方百计广开门路，引导社员向生产的广

度、深度进军，而是采取简单化的限制出工的办法，或听任劳动力出去找门路。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区党委第一书记李学智带领区党委政策研究室干部深入到银川郊区和灵武、吴忠等县的一些社队作调查研究，认真听取基层干部、社员意见，并且解到了银川郊区的满春大队和吴忠县古城大队两个先进典型。这两个大队土地、人口大体相等，可是集体经济、社员收入却相差较大。满春大队在抓紧粮食生产的同时，积极组织劳力开展多种经营和副业生产，集体经济不断发展壮大，社员收入逐年提高。而古城大队由于片面地强调以粮为纲，不注意安排劳力开展多种经营和副业生产，有时还对社员出工加以限制，结果，粮食生产虽然过了千斤，可是集体经济

总结经验 解放思想

李少白

当前，电影界都在议论“怎样把电影搞上去”的问题。我想，回顾一下解放以来我国电影事业的发展过程，总结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对于促进电影事业的繁荣是颇有意义的。这里，我谈一点个人的看法。

一九五一年三月，全国曾经举行过一次“新片展览月”，上映了《中华儿女》、《钢铁战士》、《翠岗红旗》、《上烧集中营》、《白毛女》等二十六部影片，轰动了全国。这些影片，绝大多数都是一九五〇年摄制的。但是，从“新片展览月”以后到一九五一年年底，却没有再拍出一部较长的故事片。到一九五二年才完成了《龙须沟》、《南征北战》等五部故事片。

一九五九年十月，为庆祝建国十周年，全国又举行过一次“新片展览月”，放映了《老兵新传》、《林家铺子》、《林则徐》、《青春之歌》、《风暴》、《聂耳》、《我们村里的年轻人》、《五朵金花》等十八部献礼故事片。这些影片，在思想性和艺术性方面，都达到了一个新的水平，受到广大观众的热烈欢迎。在十周年献礼片招待会上，周总理曾高兴地称赞说：“戏剧、电影可以说是开得最盛的两朵红花。”除献礼片以外，一九五九年还生产了其它许多影片。据统计，这一年完成的故事片就有八十多部。但是到一九六一年产量又大幅度下降了，只完成故事片二十九部。

我国解放后电影发展上的这两起两落，有哪些经验教训值得我们吸取？我认为，最主要的有两点：一是领导思想要按照电影的客观实际和客观规律办事；二是要调动创作人员的积极性。

全国解放前的一九四八年十月，中共中央宣传部有一个关于电影工作的指示。我认为，这个指示是从实际情况出发的，它比较正确地指导了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电影创作。它指出：“现在我们的电影事业还在初创时期，如果严格的程度超过我们电影事业所允许的水平，是有害的。”指示在讲到处理艺术与政治的关系时指出：电影剧本的标准，在政治上只要是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资本的，就可以。“还有一些对政治无大关系的故事片，只要在宣传上无害处，有艺术上的价值，就可以。至于艺术的标准，亦应从大处着眼，不应流于细节的苛求。”这个指示对电影题材的规定是：“电影剧本故事的范围，主要的应是解放区的，现代的，中国的，但同时亦可采取国民党统治区的，外国的，古代的。”这就给电影创作打开了一个广阔的天地。除了领导思想的原因以外，那时电影创作人

员革命热情高，思想顾虑少。不管是从解放区来的还是从国统区来的，思想都比较解放，没有那么多条条框框。他们有一股子干劲、闯劲、钻劲。这是取得一九五一年“新片展览月”那样大成绩的原因所在。

开展文艺战线上的思想斗争，加强党对文艺事业的领导是完全必要的。在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和文艺整风之后，电影工作者在创作思想上还有不少新的问题，而对这些问题没有能够予以明确、细致的解决。结果，有的教书的不敢教书了，写文章的不敢写文章了。这说明：光有“破”是不行的，还要有明确的“立”，否则，创作人员满脑子问号，顾虑重重，怕这怕那，是不可能搞好创作的。此外，对如何领导电影艺术创作和生产的问题，也没有解决好。当时，为了加强对电影创作的领导，成立了“电影指导委员会”，但它的许多做法是脱离实际和违背艺术规律的。如硬性规定创作题材，硬性分配创作任务，硬性规定完成期限等，创作人员把这套做法称为“强迫结婚，限期生孩子”。结果，电影指导委员会只通过了一个《南征北战》，其它的电影剧本都一天折了。没有剧本，谈何出片！鉴于这些教训，一九五三年十二月，在周总理关怀下，政务院通过的《关于加强电影制片工作的决定》指出：“在电影剧本创作的组织工作上，必须改变过去那种简单的行政命令方法。”

我们之所以能取得一九五九年献礼片那样突出的成就，最主要的原因，也是由于当时对电影事业的正确领导，从领导思想上认真地尊重了电影艺术创作和生产的客观规律。当时曾强调，领导不应以自己的感想代替政策，不应用简单的行政方式对待创作，应当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党的“双百”方针，力争电影题材、样式和风格的多样化，特别强调要注意提高艺术质量。并为此提出了《关于提高艺术片质量的报告》。正是在这种思想指导下，创作人员受到尊重，享有较多的艺术民主和创作自由，使他们的积极性和独创精神大大发扬起来。但是，这种局面没有持续多久，在电影界，正确的东西被当作“右倾机会主义”批判了，创作思想便被带上不少枷锁。加上三年国民经济暂时困难，影片生产就又走了下坡路。一九六一年和一九六二年，周恩来同志先后在《在文艺工作座谈会和故事片创作会议上的讲话》、《对在京的话剧、歌剧、儿童剧作家的讲话》中，谈到了这些教训。他指出：“三年来，我们本来要求解放思想，

敢想敢说敢做，结果反而束缚思想。”“几年来有一种做法：别人的话说出来，就给套框子、抓辫子、挖根子、戴帽子、打棍子。”他主观上以为“右倾”，就断定是“右倾”。周恩来同志特别批评了“党如何领导戏剧电影工作”的问题，指出：“做领导工作的人怎样才能把工作做好？首先走群众路线，发扬民主，贯彻集体中制。”事实告诉人们，什么时候尊重了客观实际，尊重了艺术规律，尊重了电影工作者的创造性劳动，电影事业就发展；反之，脱离实际，违反艺术规律，把群众当阿斗，搞瞎指挥，我们的事业就后退。这也是颠扑不破的真理！

人们会问：为什么有时正确的东西得不到贯彻，甚至被当作错误的东西而否定呢？我认为，原因在于“左”、右倾思想，特别是“左”倾思想的干扰。应当说，在我们电影领域，确实存在资产阶级、修正主义思想的影响和表现。对它们进行批判是完全必要的。但那时批右过头，批“左”却不足；有时，甚至把符合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富有创见的、理论和实践正确结合的东西也当作“资产阶级”、“修正主义”给批判了；相反，“左”倾机会主义的思想被当作正确的东西而加以肯定。这就搞乱了思想、理论、路线是非，妨碍了我国社会主义电影艺术事业的发展。

在电影指导委员会时期，青黄大搞极“左”，以政治代替艺术，以空想代替现实，片面地鼓吹什么写“战略思想”，搞“三大战役”等所谓“重大题材”，不顾实际情况，硬要作家一下写出这样巨大容量的作品。由于“左”倾思想的影响，使得我们的电影创作在相当长时间内，数量不多，质量不高，比较严重地存在着概念化和公式主义的倾向。

在反右派斗争以后，那个号称“理论权威”的顾问赵机大打棍子。他诬蔑电影工作者“头脑不知何处去，渣滓依旧笑春风”。有的影片被他扣上“右派思想”的帽子。有的被指责为“恋爱加X，X加恋爱，恋爱加X加恋爱，X加恋爱加X”。他叫嚷：“剧本要审查、审查、再审查。你说我干涉也好，不民主也好，还是要审查。”完全是一副文坛恶棍的面目，他是摧残电影事业和文艺事业的一个大恶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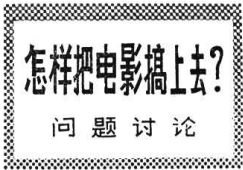
要搞好电影工作，就要解放电影的生产力，而关键是要解放思想，在空前最主要是从极“左”路线的精神枷锁下解放出来。要做到这一点，就要领导思想首先解放，大胆放手地贯彻“双百”方针，充分发扬艺术民主，走群众路线，实事求是，严格按电影的客观规律办事，给广大电影工作者以发挥积极性和创造才能的广阔天地。

革掉官僚主义的管理方法

陈敦德

一个本子要经过长时间的、多方面的周折才能通过，但电影作品的新意也常常因为这层关卡而被完全磨光了。

第三，我发现有一个不正常的现象：由某个厂拍摄的本子，往往不是厂里最好的本子，而是由某些领导人或领导部门指定的本子。有的电影厂说他们是“专门吃天上掉下来的馅饼的”。有些认真钻研业务又不谦虚谨慎的领导同志，有时以真理的标准和化自居，似乎经了他们的手，就是最好的“馅饼”无疑。结果领导的指示落实了，片子拍了，观众不爱看，国家受了损失，这些领导却毫无责任。怪不得最近有的观众看了一场国产新片，将电影票寄给有关领导，要求退回一角五分，因为他觉得该片票价只值五分钱。我记得有本回忆录里写过，有个音乐家写了曲子去向列宁请教意见，列宁说自己喜爱音乐，可不一定懂，让他还是去向别的行家请教，或是泰给大家听听，看看效果如何。列宁部如此谦虚，我们的某些领导人也该深思深思。一定要废除官僚主义的电影生产管理方法。权力不要过于集中，可以下放，要给予地方和生产部门多一点自主权，发挥他们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文化领导部门主要掌握党的方针、政策和贯彻落实情况，以及制订电影规划、组织中外电影交流等。衙门式的管理方法不革除，电影就一定徘徊不前。



要民主与科学就要敢于革命

川岛

在《新青年》六卷一号上，有篇文章，题为《本志罪案之答辩书》其中说：

“……要拥护那德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孔教，礼法，贞节，旧伦理，旧政治。要拥护那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旧艺术，旧宗教。要拥护德先生又要拥护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国粹和旧文学。”又说：“我们现在认定只有这两位先生，可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

“五四”时期所说的“德先生”和“赛先生”，即“民主”与“科学”。在这之前，也曾提出过“民主”与“科学”，但“五四”时期所说的“德先生”和“赛先生”，其意义和影响所及，却非维新运动时期托古改制的议会政治的民主主义所能比拟，也不是坚甲利兵的洋务运动时期的科学皮毛所能比拟的。这回是要革命而不是改良。“民主”与“科学”也就是革命的口号、革命的提调，就是现在大家公认的“五四精神”。

五四运动时期，各种思想非常活跃，进步的刊物如雨后春笋般涌现。仅仅在现在称作“红楼”、当时是北京大学第一院门口的一间小号的房子里，就有经售的书刊杂志一百多种摆在一张长形案子上，显示了一九一九年是中国生气盎然的出版年。从早到晚，不论是学生还是教师，老年或是青年，走过那里都要进去看看，犹如现代我们听广播，看电视那样，去寻找救治中国的真

理。当然，在当时那陈列着的一百多种书刊杂志中，也不是没有乱七八糟应该扬弃的东西。

拥护德先生和赛先生是为了救治中国；拥护德先生和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国粹和旧文学。在究竟肯定哪些一些与否定哪些一些的工作中，“五四”文学运动的倡导者们发掘出好多为“前贤秉正，视同沙土”的和长期被诬蔑为“诲盗诲淫”的古典文学作品，如唐宋传奇、宋元话本、南戏、元杂剧、散曲、民歌以及《三国演义》、《水浒传》、《红楼梦》等等，给了它们以应有的历史地位。虽然在估价中有些简单化的倾向，却给了卫道的国粹主义者以沉重的打击，也丰富了枯燥和贫乏的文学园地。

五四运动时期，我们的前辈大师们，还把大量外国的优秀文学作品介绍了进来。鲁迅先生曾把这一工作比喻为神话中偷火给人类的普罗洛米修士，私运军火给造反的奴隶们；并且说：“译本不但在于输入新的内容，而且也在于输入新的表现法。”这显然是要从外国进步的文学作品中吸取适合我们实际需要的营养。翻译和介绍外国的进步文学作品，打开了人们的眼界，不仅推动了当时的革命运动，而且对当时的文学革命也是一个有力的促进。

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在艰难困苦岁月中奋战了二十多年，直到一九四二年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之后，文艺工作者们才有所适从，才明确了“为工农兵服务”的方针。“五四”新文化运动是六十年以前的事情，毛泽东同志的《讲话》也已经三十七年了。三十几年来，文艺工作者是有成绩、有功勋的，是从坎坷崎岖的路上走过来的，是党正确领导的结果。今天，我们伟大的新长征，也是在党的英明领导下进行的，这比五四时期不知优越多少倍。五四运动的经验以及后来革命运动的经验告诉我们，德先生和赛先生都不是轻易就来的，要民主与科学，就要敢于革命。

“小姑”小议

拾风

文艺部门的领导人，究竟不像做一家一户的婆婆那样简单，媳妇是很多的婆婆。婆婆当然，当然不可能事必躬亲，对媳妇们的情况的热悉和了解，需要通过各种渠道来取得。小姑也是不可少的。情况明，然后才可能有针对性地进行领导。因此，如实地反映情况，对小姑来说，非常之重要。如是，是事实求是，有好处，有坏处，有几分说几分，不能掺杂一点个人的好恶爱憎。不顾事实，投婆婆之所好，或者歪曲事实，挟嫌诬陷，都是极坏的。婆婆轻信小姑的不符事实的情况，轻率判断一件事或一个人，

造成不良后果的例子有的是。

可见要做“开明婆婆”并不容易。对小姑的话，只能又听又全听，又信又不全信。千万要因亲近而轻信。撇开小姑奸刁蓄意制造假情况的因素不谈，即使小姑自认反映了客观，但由于事物的复杂性，其本质为现象所遮盖，一时不易暴露，把现象当本质来反映，虽然未必出于恶意，但也不能不察。因此也是不能全信的。首先要尊重媳妇，平等相待，这是前提；同时，对身边小姑反映的情况一定要保持冷静，尤其是对人对事作出至关重要的决定时，最好能避开双脚到媳妇中间走一走，听一听，调查研究一番，那样可以辨明情况的真与伪，也可以识别小姑的贤与刁。

“知错能改即圣贤”

——重看越剧《胭脂》有感

王定国

最近，浙江越剧团为首都人民带来了一出好戏《胭脂》。

早在五十年代，毛泽东同志就曾建议大家去看《十五贯》，期望干部们特别是领导干部，能够有所感动。到了六十年代初，毛泽东同志发动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又向领导干部推荐几篇有关文章，以供学习，其中一篇就是蒲松龄写的《聊斋志异》中的《胭脂》。周恩来同志曾同毛泽东同志一起观看《十五贯》，亲自参加座谈会，又看过浙江越剧团演出的《胭脂》，赞扬这场出戏可以同《十五贯》媲美。当时的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谢觉哉同志，一九六三年四月在杭州视察工作期间，也特地去看《胭脂》，并且兴致勃勃地写了一首称赞这出戏的诗：

念之忽差毫厘，毫厘之差谬千里。胭脂一剧胜针线，启智判冤者喜。谢老还将这首诗亲手题书给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正之。看戏之余，写了诗，又何必题给人民法院“正之”呢？“法院”与“戏院”又有什么联系呢？可见，看戏不只是看热闹而已，而是要有所“得”的。因为，艺术就是生活的再现。蒲松龄把那个时代的生活写到的文艺作品里，存之于祖国艺术宝库中。我们今天重读他的一些作品，仍然感到有所受益。

《胭脂》是根据蒲松龄的同名小说改编的。作品描写一个冤狱案件：匡匡三的女儿胭脂与书生郭铁树邂逅相逢，产生爱慕之心。热心人宿介、王春兰想从中成全，不料被凶徒毛大钻了空子，酿成命案。全剧以鲜明的主题和曲折的情节，使观众对于知县、知府、学台这三个人物，悠然发出怨恨、惋惜和称赞的心声！

昏昏然不负责任的聊斋知县张宏，主观臆断，玩忽人命，仅以绣鞋为证，便认定郭铁树是杀人凶手，造成冤狱。东昌知府吴南信，倒是个精明干练、肯动脑筋的好法官，在审查聊斋积案中，认为“桩桩件件皆可笑，破绽百出令人惊”，发现了“聊斋郭铁树杀人案，判词含混不明，分明是屈打冤枉招供”。于是，他混装为货部，下乡暗访，从而发现了原形的框框，发现了毛大的可恨，找出了这个案件这个线索。然而，又由于吴南信的自命不凡、骄傲自大，虽有为黎民百姓办事的心，但却因法理不深，经验不好，阅历太浅，既没有详细进行现场勘验，又没有取得充分、确凿的证据，

去年春节，我开始从事电影创作。一年多以来，用我们作者的话来说，我尝了“触电”的味道。党对艺术的领导是完全必要的，但我感到，要把电影事业搞上去，必须扫除“瞎指挥”，革掉衙门式的官僚主义管理方法。

我发觉，我们现在改本子的过程，几乎等于是落实某些领导意图的过程。我见过不少从生活中来的本子，本来有一点纯朴的气息，有点思想火花，提出了一些较为重大的社会问题，或有一点艺术的探索，可是有些领导就是不喜欢，非要改掉不可。这些领导有的是出于好心——有余悸的好心，有的是从政治概念出发，也有的是对艺术外行。厂里的某些编辑人员，也有自己的艺术观点和艺术见解，可是他们知道说出去也很难实现，因此，他们往往不得不好领导的“图”去“索骥”。稿子组织来了或没写好，编辑又成了汇集各级领导意图的“秘书”，将它灌输给作者，让作者去落实。每改一稿，有的领导还很关心自己上次的意见是否落实了，凡是按他的意图去改了的，他就喜欢，才允许通过；否则，他就要拉下脸来。往往几个同级的领导意见截然相反、互相矛盾而无法同时落实，作者只能目瞪口呆，啼笑皆非。结果，改来改去，生活气息、斗争锋芒、艺术情趣统统消磨殆尽，本子也就换了面目了。这是第一。

第二，是关卡重重。有人统计过，前一个时期，一个本子，从写了稿子到拍摄过场，要经过十道关卡。电影厂编辑室和厂领导通过过后，还要经过好多层上级领导机关，甚至什么审查剧本的组织……层层都有领导意图，层层都须落实修改。

第三，我发现有一个不正常的现象：由某个厂拍摄的本子，往往不是厂里最好的本子，而是由某些领导人或领导部门指定的本子。有的电影厂说他们是“专门吃天上掉下来的馅饼的”。有些认真钻研业务又不谦虚谨慎的领导同志，有时以真理的标准和化自居，似乎经了他们的手，就是最好的“馅饼”无疑。结果领导的指示落实了，片子拍了，观众不爱看，国家受了损失，这些领导却毫无责任。怪不得最近有的观众看了一场国产新片，将电影票寄给有关领导，要求退回一角五分，因为他觉得该片票价只值五分钱。

我记得有本回忆录里写过，有个音乐家写了曲子去向列宁请教意见，列宁说自己喜爱音乐，可不一定懂，让他还是去向别的行家请教，或是泰给大家听听，看看效果如何。列宁部如此谦虚，我们的某些领导人也该深思深思。一定要废除官僚主义的电影生产管理方法。权力不要过于集中，可以下放，要给予地方和生产部门多一点自主权，发挥他们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文化领导部门主要掌握党的方针、政策和贯彻落实情况，以及制订电影规划、组织中外电影交流等。衙门式的管理方法不革除，电影就一定徘徊不前。

更听不进被告人的辩护，而且错误地用刑讯逼供的方法，非法取得了宿介的画押，判处宿介的死刑。从此，吴南信虽然昭雪了郭铁树的冤案，却又造成了好心没办好事的宿介的冤狱。

就在“死罪复核”的过程中，出现了为官四十年而颇有人物、为人正直的省级教育学家“学台”施愚山这个人物。他以知县张宏、知府吴南信的身份，参予了这一案件的复查，谆谆诱导门生吴南信“知错能改即圣贤”，要他主动纠正这一错案。可是，自恃过高的吴南信，为了保住自己知府的面子，求得个“清正官名”，以便“流芳百世”，不仅听不进学台的苦口婆心，反而放辟地顶撞了老师，坚持错误，不打算复重审。正在这样思想斗争十分尖锐的情景下，刑部（相当于现在的最高人民法院）批文下来了：无辜的好人宿介，马上就要被杀头；而吴南信却要随之升官！然而，吴南信终究还是那个本质不变、立志要做清官的颇有地负人的，他还对堂属“恨思守志”的座右铭，不得不“寻思改过”了。老师施愚山的诚恳教诲，被告宿介的当堂申辩，知县张宏的嫉妒和讥讽，一幕幕映在吴南信的眼前……吴南信终于以最大的勇气和负责精神，敢言违掉乌纱帽的风险，不计较个人得失，而大胆决定：“火速呈文报刑部，吴南信甘愿重罪，推翻原判再重审！”他终于听从了老师学台的“知错能改即圣贤，务须明辨冤屈间”的教诲，改正了这桩错案，使被冤枉的郭铁树和宿介都得到平反，使真正的杀人凶手毛大得到了应有的惩罚。

今天，在打破林彪、“四人帮”的封建法西斯专制主义的长期禁锢，《胭脂》重新上演的时候，使我们不得不追忆往事，怀念故人，思诸万千！它对我们当前正在制定刑法和刑事诉讼法的工作，是有重大启示的：它对我们贯彻中央精神，落实党的各项政策，也是有深刻的现实意义的。看《胭脂》的感想，当前，全党全国遵循党的十一大路线和三中全会精神，进行平反冤、假、错案的工作，落实党的各项政策和对其他人的政策，确是一件大事。因为，有错不纠，或明知有错而坚持不改，那就不符合党的实事求是的作风和原则。如果是非不清，沉冤不明，无辜的好人受压制，优秀的人才被埋没，广大干部和群众心不平、气不顺，积极性便无法调动，安定团结也就难以保证，这样，党的优良传统和民主作风，又如何恢复和发扬呢？

吴南信知错改错的精神，对我们今天的干部，我想是有借鉴意义的。一个封建官吏尚且能如此，我们无产阶级干部难道不应当如此么？知错就改总是好，“知错能改即圣贤”啊！

